

贵州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杨红艳

(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在借鉴西方消费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回归法,从收入的不同角度分析了 1978—1997 年和 1998—2012 年两个时期贵州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1978—1997 年,不同收入都对贵州消费有着重要影响;1998—2012 年,滞后一期收入对消费基本上没有产生影响,其他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逐步减弱。

关键词:可支配收入,消费,贵州,城镇

近几年,贵州省的经济实现两位数发展,但消费却增长缓慢。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2008 年欧美金融危机以后,在国外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内需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消费跟不上就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又一次被提上日程,成为大家关注的课题。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消费理论都认为,收入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收入的变化决定着消费的变化。因此,本文从收入的不同角度来探讨其对消费的影响。为了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在研究贵州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问题时,将消费和收入指标均按 1978 年可比价格进行计算。文章中所采用的数据都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数据计算而得。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 1978—1997 年,此时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处于供给短缺状态,无论是居民收入、消费还是价格都是高速增长时期;二是 1998 至今,此时总需求绝大部分时间小于总供给,收入增长速度下降[1]。因此,以 1997 年为界点分成 1978—1997 年和 1998—2012 年两个阶段来进行分析。

一、现期收入对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第一个消费函数,开创了应用消费函数理论研究消费问题的先河,他的消费函数理论被后人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2]。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及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被许多早期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但是,由于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他的这种理论和观点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西蒙·库兹涅茨按交叠的十年发表的 1869—1938 年美国国民收入分产品估计表明,平均消费倾向并没有随收入而稳定下降,而是一直保持着稳定,除 1924—1938 年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在 0.84—0.89 之间。这便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反论”,他否定了凯恩斯的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上升而递减的论断。这样看来,在长期中消费与收入则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比例,消费函数的形式就将得到改变,即表现为没有截距项的过原点的函数形式[2]。“库兹涅茨反论”应是对凯恩斯理论的一种修正。

我国学者实证分析表明,1978 年以前,居民现期消费主要取决于现期收入;1978 年以后,由于居民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居民现期消费与现期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但现期收入对消费仍有很大的解释力(臧旭恒,1994)[3]。现在我们利用贵州省城镇居民消费

的数据来分析居民现期收入与现期消费的关系。这部分使用的数据是 1978—2012 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已按 1978 年的可比价格进行换算。建模如下：

$$C_t = \alpha + \beta Y_t + \varepsilon_t \quad (1)$$

C_t -现期消费支出， Y_t -现期人均可支配收入， ε_t -残差项， α 、 β -系数

利用SPSS10.0软件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下：

1978—1997年：

$$C_t = 64.602 + 0.745 Y_t$$

$$t \quad (5.271) \quad (37.356)$$

$$F=1396, R^2=0.987, DW=1.698$$

1998—2012年：

$$C_t = 224.674 + 0.6 Y_t$$

$$t \quad (14.865) \quad (73.302)$$

$$F=5373, R^2=0.997, DW=1.336$$

回归模型表明，贵州省城镇居民有较为稳定的消费倾向，现期消费支出与现期收入有着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平均每增加 1 元可支配收入，1978—1997 年间将有 0.745 元用于增加当期消费，而 1998—2012 年间有 0.6 元用于增加当期消费，这说明他们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很高。这段时间贵州省城镇居民增加的可支配收入近 2/3 被消费掉了，用于储蓄的部分只占 1/3，这大大地推动了贵州省商品交易市场的繁荣。

二、过去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过去收入是指过去的时间里人们所得到的收入，这里指贵州省城镇居民过去年份所取得的可支配收入。过去收入又称为滞后收入，根据过去时期的长短又可分为滞后一期收入，滞后二期收入……关于滞后收入对现期消费的影响，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霍尔在其“随机游走”的模型中将滞后收入与滞后消费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对即期消费进行回归，得出结论是过去收入的系数并不显著，他认为滞后消费对即期消费更有解释力[2]。臧旭恒(1994)对霍尔的随机游走模型进行了检验，构造滞后一期消费支出与滞后收入的模型，即

$$C_t = \alpha + \beta_1 C_{t-1} + \beta_2 Y_{t-1} \quad (2)$$

C_{t-1} —滞后一期消费， Y_{t-1} —滞后一期收入

臧旭恒分别用 1978—1991 年全国城镇居民与全国农村居民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回归，全国城镇居民的回归结果拒绝了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因为滞后一期收入系数仍然显著。这表明，滞后收入仍然对现期消费有很好的解释力，而同时，滞后一期消费支出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滞后一期消费支出对现期消费没有解释力。全国农村居民的回归结果则证实了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即以滞后消费和滞后收入作为自变量的回归中，滞后收入变量有一个微小的、负的系数，滞后收入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解释力不足。根据臧旭恒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有着不同的消费行为特征。城镇居民因为有相对稳定的收入，这使得他们能够根据过去的收入情况预测将来收入情况，并以此安排消费支出。虽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使城镇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但相对于农村居民还是较为稳定的。农村居民则对过去形成的消费经验更为依赖，根据过去的消费习惯来安排消费支出。

贵州省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是否也呈现出这样的情况呢？即他们的当期消费支出是否与滞后收入或是滞后消费支出有关？如果消费支出与滞后消费有关，而与滞后收入并没有关系，则说明当期消费支出取决于贵州省城镇居民的过去消费经验，那么要促进消费支出的持续增长，则需要更多的从改变贵州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开始。如果贵州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更多的表现为与滞后收入有关，则说明贵州省城镇居民对过去的消费习惯并不依赖，而更多的是根据过去的收入情况来决定消费支出。这也将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过去收入可能并不仅仅作为一种过去的收入状态而存在，而且有可能形成了一种城镇居民对将来收入的预期。过去收入作为一种将来的预期收入而存在。在这一部分将通过有关数据分析滞后收入与滞后消费对贵州城镇居民现期消费的影响。检验贵州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是否遵循“随机游走”假说，探寻过去收入对现期消费的影响，它可以反映贵州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是否受到预期的影响。建立模型如下：

$$C_t = \alpha + \beta_1 C_{t-1} + \beta_2 Y_{t-1} + u \quad (3)$$

C_{t-1} —滞后一期消费， Y_{t-1} —滞后一期收入

数据是采用 1978—1997 年和 1998—2012 年贵州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贵州城镇居民滞后一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回归结果如下：

1978—1997年：

$$C_t = 118.05 - 0.356C_{t-1} + 1.001Y_{t-1}$$

$$t \quad (4.957) \quad (-1.211) \quad (4.501)$$

$$F=402.306, R^2=0.981, DW=1.927$$

1998—2012年：

$$C_t = 106.278 + 0.444C_{t-1} + 0.397Y_{t-1}$$

$$t \quad (1.295) \quad (1.124) \quad (1.631)$$

$$F=1181, R^2=0.995, DW=2.217$$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看，1978—1997 年滞后一期消费支出系数并不显著，但滞后一期可支配收入对现期消费支出却有很好的解释力，这显然拒绝了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与臧旭恒回归的 1978—1991 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情况相同。过去一期收入每增加 1 元贵州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将增加 1 元，比现期收入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说明贵州省城镇居民更加在意过去一期的收入情况。由于这段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非常快，所以其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稳定的收入预期，再加上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基本健全，居民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边际消费倾向很高。1998—2012 年常数项、滞后一期消费和滞后一期收入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这段时期他们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是此时收入增长速度放缓，再加上涉及民生的企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这些改革使得人们的不确定性增强，所以人们更加重视现在未来，而不是过去。

三、工资性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

按照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居民收入可分为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两个部分。由于暂时收入的增加是不确定的，居民会倾向于将这部分收入用于储蓄，居民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函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成分逐渐加大。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视为持久收入的体制内基本工资增长并不快，主要是体制外的收入增长很快（刘岚芳，1999）[4]。以工资性收入代表持久收入（ Y_t ），人均年实际收入与持久收入的差为暂时收入（ Y_1 ）。改革开放初几乎占人均实际收入 100%的持久收入经历了 1985 年的放权让利，降到 80.44%，之后一直下降。尽管 2000—2007 年由于贵州省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工资上调使这一比例有所上升，到 2007 年这一比例为 70.03%，之后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12 年降为 61.41%。

现在我们建立模型来检验城镇居民持久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模型如下：

$$C_t = \alpha + \beta_1 Y_p + \beta_2 Y_t \quad (4)$$

Y_p —工资性持久收入， Y_t —暂时收入

回归结果如下：

1980—1997年：

$$C_t = 32.525 + 0.845 Y_p + 0.671 Y_t$$

$$t \quad (0.671) \quad (5.855) \quad (6.666)$$

$$F=448.146, R^2=0.984, DIF=1.937$$

1998—2012年：

$$C_t = 260.923 + 0.662 Y_p + 0.360 Y_t$$

$$t \quad (16.330) \quad (16.366) \quad (5.764)$$

$$F=2435, R^2=0.998, DIF=2.022$$

从分析结果来看，工资性持久收入基本用于消费支出，即每增加 1 元的持久收入，两个阶段分别有 0.845 元和 0.662 元用于当期的消费支出，这一比例较高，表明贵州省城镇居民愿意将这种较为稳定的收入大部分消费掉。暂时收入也对消费支出有影响，暂时收入每增加 1 元，将有两个阶段分别有 0.671 元和 0.360 元用于当期消费支出。1980—1997 年间人们更加注重消费，无论哪种收入都对消费产生重要的影响，但 1998—2012 年间这种状态发生了变化，无论哪种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都在减弱，人们更加注重储蓄而不是消费，以预防由于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结论和建议：1978—1997 年，现期收入、滞后一期收入、工资性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都对消费产生重要影响，滞后一期消费对现期消费没有产生影响；1998—2012 年，现期收入、工资性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对消费产生重要影响，滞后一期收入和消费对现期消费没有产生影响。可以看出，第一阶段由于人们预期稳定，收入增长迅速，所以消费支出高；第二阶段由于收入增长放慢以及受到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消费减弱。因此，一方面应大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应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减少人们的不确定性，稳定人们的预期，激发其消费欲望。

参考文献：

- [1]徐连仲. 改革开放经济运行四大阶段[J/OL]. 瞭望新闻周刊, 2013, (8).
- [2]战昱宁. 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天津: 南开大学, 2009: 8-15.
- [3]臧旭恒. 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152, 173.
- [4]刘岚芳. 体制转轨中居民收入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J]. 预测, 1999, (4): 9.